

3-2015

《嶺南學報》小史述略：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Zhan HUANG

嶺南大學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湛 (2015)。《嶺南學報》小史述略：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頁499-505。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iss1/24

This 附錄 Appendice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學報》小史述略

——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黃 湛

一、前 言

1888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廣州創建格致書院。1903年，書院更名為“嶺南學校”，是為“嶺南”用作校名之始。1927年，學校易名為嶺南大學，鍾榮光先生出任校長。自此，嶺大發展為文、理、商、工、農、醫兼顧的綜合性學府。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致使大批學者避難粵廣，不少人進入嶺大執教。這一歷史機遇，也鑄就了嶺大最為輝煌的一段學史。1952年，全國大專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教會大學無法繼續存在，嶺大遂被分割合併至其他數所大學。其中，文理科撥歸中山大學，而原嶺大校址康樂園也成為中山大學的新居。

表徵嶺大學術成果者，乃20世紀上半葉世所推重的《嶺南學報》。《學報》於1929年12月創刊，1952年6月隨著院系調整而終刊。23年間，《學報》共刊行35期。下文即對《學報》歷史做一個回顧。

二、嶺大創校與《學報》的早期經營(1929—1941)

1929年12月，《學報》由文哲及宗教史家謝扶雅主持創刊。創刊號《徵文啟事》寫明，《學報》之刊行乃“期於倡導學問，闡揚真理，賞奇析疑”^①。

^① 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學報編輯委員會《嶺南學報》第一卷第1期(1929年)。

起先數年,《學報》刊登的論文內容廣涉文學、歷史、工學、農學、醫學等領域。自1933年(第二卷第4期)起,始將範圍限定在文史及社會學方面。

此間最為可書之事,為饒鏜、饒宗頤父子合力著寫之《潮州藝文志》的發表。《藝文志》先由饒鏜編寫,書未竟而饒鏜病逝,其子饒宗頤遂補訂其餘。饒宗頤先生當年尚未及弱冠,所書已顯現深厚學識。《藝文志》共二十卷,其中十三卷分別發表於《學報》第四卷第4期(1935)及第六卷第3、4期合刊(1937)。1937年,嶺大“因國難,校址遷移”,《學報》刊行工作“遂致中輟”^①。直到1947年纔正式復刊(十年中僅1941年刊載一期)。而《藝文志》未發表的後七卷,竟不幸於戰火中遭兵燹遺失。《藝文志》與《學報》的命運可以說是息息相關,其已刊之文有賴《學報》得以留傳;而遺失未刊之稿,終成潮州文化、學界、史界之一大損失。

三、學者南來與《學報》的輝煌期(1947—1952)


1948年8月,校董會決定借聘時為南開大學校務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陳序經教授出任嶺大校長一職,以期重振嶺大風采(當時嶺大正面臨經費困擾及師資疲軟等問題)。陳序經是著名的“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他曾入讀嶺南中學,1928年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後兩度執教於嶺大社會學系。此次接掌嶺大,陳序經立意將嶺大打造成全國最優秀的學府。他於上任前就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積極聯絡海外華僑捐資,並親自赴港籌得一筆可觀資金^②。二是親往北平的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協和醫院等學術機構拜會學者教授,誠聘有意南下者到嶺大任教(其中不少人曾與陳序經在西南聯合大學共事,如陳寅恪、王力、姜立夫、吳宓等)。經過陳序經的不懈努力,加之內戰轉劇的歷史環境,不少學者接受邀請加盟嶺大。至1949年,嶺大已匯聚了一批國寶級教授,可謂是人文薈萃、精英雲集。其中包括陳寅恪(史學)、容庚(文字學)、王力(語言學)、梁方仲(經濟史學)、姜立夫(數學)、謝志光(醫學)、莊澤宣(教育學)、陶葆楷(工程學)、吳大業(經濟學)、吳宓(文學)、陳永齡(測繪學)、

^① 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學報編輯委員會《嶺南學報》第三卷第4期(1941年)。

^② 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頁。

吳尚時(地理學)、周連寬(檔案學)等。

嶺大的學術地位因此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尤其是文史專業,更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學報》於1947年復刊後,至1952年共刊行11期。本校學者中,語言學巨擘王力先生有《漢越語研究》、《東莞方音》、《珠江三角洲方音總論》、《台山方音》、《海南島白沙黎語初探》^①等方言研究著述。其中,刊登在《學報》第九卷第1期的《漢越語研究》(1948),發表之初便產生轟動,至今仍是國際漢越語研究中的權威性著作。再如經濟史學大師梁方仲先生,於《學報》先後發表《明代黃冊考》、《易知由單的研究》、《明代一條鞭法年表》三文,對於明代賦役制度的研究至關重要。其廣徵博引、嚴謹科學以及對社會經濟的關注,歷來為史學界所推崇。

除本校文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外,《學報》亦接受不少校外來稿。如古文字學家羅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第七卷第2期,1947)、《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第九卷第1期,1948),經史學家朱師轍《清史述聞》(第十一卷第1期,1950)等文,都極具文獻價值。特別是文字學家楊樹達先生(楊氏1948年曾至嶺大作短期訪問講學),1949—1951年間在《學報》上發表的七篇論文尤應予以重視。包括《論語四章疏義》(第九卷第2期,1949)、《古爵名無定稱說》(第十卷第2期,1950)、《積微居彝器銘文說》(同上)、《釋》(第十一卷第1期,1950)、《彝銘中所見之古人》(同上)、《彝銘中之本字》(第十一卷第2期,1951)、《新識字之由來》(同上)。其中,《論語四章疏義》一文,乃楊先生在早年著述《論語疏證》的基礎上,重以群書校勘後,於《為政》“吾十有五”、《八佾》“夷狄之有君”、“子謂《韶》”、《雍也》“齊一變”四處頗得新意,故撰成《疏義》一文^②。但該文自發表後,數十年來出版的《論語疏證》,皆未補錄此內容。又,楊氏一生於彝器銘文研究用力最勤,相關成果多收錄於《積微居金文說》中,但該書卻未載《學報》刊發之《彝銘中所見之古人》、《彝銘中之本字》二文。就筆者所查,《論語四章疏義》、《彝銘中所見之古人》、《彝銘中之本字》三文似亦未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諸版《楊樹達文集》中,這一疏漏值得重視。

《學報》刊載之論文,以陳寅恪先生十二篇最為豐碩。嶺大中文系榮休教授馬幼垣曾言:“陳(寅恪)先生居穗,既關係嶺南文化,復為嶺南大學校

① 除《漢越語研究》一文外,其餘數篇皆為合撰。

② 嶺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室、學報編輯委員會《嶺南學報》第九卷第2期(1949年)。

史不可或缺之一部分。”^①下面將就陳氏與嶺大及《學報》之淵源略作表述。

四、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1948年年底,國共內戰逼近北平。12月15日,陳寅恪一家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等人,一同乘坐專機飛往南京。儘管傅斯年一再電邀陳寅恪抵臺,但陳寅恪最終選擇前往廣州。其實早在年初,他已致信嶺大校長陳序經,表示有意赴嶺南休養。陳序經遂聘請陳寅恪至嶺大任教^②。相比其後十數年遭受的政治迫害,陳寅恪在嶺大任教的四年(1949—1952)無疑是生活安定、教研順利的日子。

陳寅恪發表於《學報》的論文,七篇是《元白詩箋證稿》的補充論證,包括《白樂天之先祖及後嗣》(第九卷第2期,1949)、《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論元白詩之分類》、《元和詩體》、《白樂天與劉夢得之詩》(第十卷第1期,1949)、《白香山琵琶引箋證》、《元微之古題樂府箋證》(第十卷第2期,1950)諸篇。前五篇在陳寅恪執教嶺大前,已在1948年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第十五卷第1期)。這些文章其後再刊於《嶺南學報》,或許因為當時南北戰事的原因,學術流通受阻。而陳氏以為年前所投稿未必能在戰事吃緊的北平出版,方復投之於《嶺南學報》。他對元白詩的研究,在赴嶺大之前蓋已完成,南下後在嶺大數年,當主要從事唐史研究(詳見下文)。而1950年發表於《學報》的兩篇“元白詩”論文,蓋亦是陳氏自北平攜帶南下的成稿。

值得一提的是,“元白詩”是陳寅恪教學研究的一貫重點:早年在清華大學中文系,陳氏即專授“元稹白居易”^③等課程;抗戰時期完成《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執教嶺大後,任中文系及歷史系教授,開設“白居易詩”課程^④;

① 馬幼垣《編者言》,載《嶺南學報》新第1期(1999年)。

② 陳寅恪《第七次交代底稿》寫道:“我和唐質都有心臟病,醫生說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嶺南大學。抗戰時期南開、清華、北大遷往雲南併為西南聯大,所以認識陳序經。遂寫信與他,可否南來休養一個時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來嶺南教書。”詳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頁。

③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57頁。

④ 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3頁。

1952年嶺大文理科劃入中山大學後，陳氏在歷史系又開設“元白詩證史”等課；直至1958年6月29日，中山大學因大躍進熱潮而停課，給陳寅恪的授課生涯畫上句號^①。

1950年，嶺大中國文化研究室出版《元白詩箋證稿》，書後將此七篇發表於《學報》之論文合為《附論》，一併刊行。其書出版後，陳寅恪即將之寄予友人。此事可見於楊樹達先生1950年12月23日致陳寅恪的信。信中言：“昨承賜寄大著《元白詩箋證稿》……蓋自有詩注以來，未有美富卓絕如此書者也。前於《嶺南學報》讀大著說唐詩諸篇，即歎其精絕，謂必深入如此而後有真正之文學史可言。”^②《元白詩箋證稿》寫成多年，作為摯友的楊樹達卻初讀此書，足見陳寅恪“元白”諸作能够在學術界廣泛流通，得賴嶺大之及時付梓。何言“及時”二字？乃因陳寅恪來嶺大前十數年以及之後在中山大學的十數年，著述頻遭劫難——抗戰時期四處輾轉，導致“廿年來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③。而晚年整理就緒準備出版的文稿，亦因“文革”查抄而多難覓其蹤。由此可見，《元白詩箋證稿》作為陳氏箋詩最佳之作，得嶺大協助出版，實為陳寅恪其人以及整個學術界之幸事。

陳寅恪擅長中古史研究，執教嶺大後，便在歷史系開設了“魏晉南北朝史”、“唐史專題研究”等課^④。《學報》刊載陳氏論文除前述七篇為“元白詩”範疇外，其餘五篇則探討中古史學。包括《從史實論切韻》（第九卷第2期，1949）、《〈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第十卷第2期，1950）、《崔浩與寇謙之》（第十一卷第1期，1950）、《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第十一卷第2期，1951）、《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第十二卷第1期，1952）等文。

《從史實論切韻》、《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三文，是陳寅恪對於以往研究的進一步發揮：其中《從史實論切韻》與早前發表的《東晉南朝之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卷第1期，

① 根據中大學生劉隆凱的日記記錄，那一日陳寅恪正講授“元白詩證史”一課，因停課活動而被迫終止。劉隆凱整理《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② 楊樹達《與陳寅恪書》，載《積微居小學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8頁。

③ 包括“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注”、“五代史記注”、“佛教經典之存於梵文者與藏譯及中譯合校”、“巴利文長老尼詩偈集並補譯及解釋其詩”等。見1941年9月23日陳寅恪《致劉永濟信》，載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4—245頁。

④ 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50頁。

1936)遙相呼應。《東晉南朝之吳語》指出東晉南朝士族皆以北音(即洛陽音)為尚^①;《從史實論切韻》則詳細分東晉之韻為“南染吳越”之北音、“夷虜雜糅”之北音以及南朝所保留的洛陽舊音三類,並由此推論陸法言所撰《切韻》語音系統,乃依洛陽舊音而得^②。《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及《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二文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延續。二書於1940年前後著成,其考訂之精當,見解之獨到,毋庸贅言。陳氏鑒於其書所論未備,故專擇“山東集團”及唐與突厥關係兩處,作更為詳細的疏證。

《崔浩與寇謙之》這一涉及南北朝人物的課題,是陳寅恪來嶺大後纔開始著手的研究。此文以崔浩與寇謙之投契關係為切入點,對當時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的發展變化做了深入的剖析^③。至於《〈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一文則並非新作,陳氏來嶺大前便已發表多次,續有補正。其寫作緣起是因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同事俞平伯於1928年比較《秦婦吟》各本異同,相贈寅恪,寅恪遂作《讀〈秦婦吟〉》一文(《清華大學學報》第十一卷第4期,1936)。此文後又有1940年昆明印綫裝本,改題為《〈秦婦吟〉校箋》;1950年《嶺南學報》本,改題為《〈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1980年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寒柳堂集》,又改之為《韋莊〈秦婦吟〉校箋》^④。

算上投往嶺大的《南國》等其他刊物的論文,陳寅恪於嶺大任教期間,總共發表了二十餘篇論文。然陳寅恪於嶺南四年的研究成果絕不止於此,其更為史界推崇的《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論韓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文,即因1952年嶺大的瓦解以及《學報》的終刊,不得不轉投他處^⑤。此事雖無關學術界之得失,而於嶺大、《學報》而言,實乃一大遺憾。斯人已逝,但陳寅恪與《學報》之“因緣”卻不應就此結束——相信《學報》復刊之日,必會秉承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學理念。

①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82—409頁。

②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04—309頁。

③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20—158頁。

④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22—156頁。

⑤ 《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發表於《歷史研究》第1期(1954年)、《論韓愈》發表於《歷史研究》第2期(1954年)、《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發表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56年)。此三篇後皆收錄於《金明館叢稿初編》。

五、《學報》的復刊及展望

1967年9月，嶺南大學校友在香港籌辦嶺南書院，開始嶺大復校的第一步。1991年，嶺南升格為香港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之一，並於1999年正名為“嶺南大學”。同年，在中文系馬幼垣教授的帶領下，嘗試重辦《嶺南學報》。惜此次復刊只維持三期，便因馬教授退休離港等原因於2006年休刊。《學報》在港復刊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不言而喻，然“編輯新卷所獲之經驗實非可得自他務者”^①。此次嘗試，為以後的再次復刊提供了珍貴的借鑑經驗。

《學報》本次復刊事宜，由嶺南大學講座教授蔡宗齊主持籌策。《學報》將延續以刊載古典文史哲研究論文為主的一貫傳統，並且擴展涵蓋面，刊登探討傳統學術和文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影響的文章。《學報》秉承“倡導學問，闡揚真理，賞奇析疑”的精神，同時又力圖促進中西學術深度交流，開天下學問一家的風氣。為此，《學報》將與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大學國際漢學研修基地袁行霈教授及本系蔡宗齊教授共同創辦的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簡稱 *JCLC*) 結為姊妹雜誌。《嶺南學報》刊載的論文不僅有來自漢語世界具有較高學術含金量的投稿，還有 *JCLC* 所接收英文論文的中文版。同時，《嶺南學報》還將為 *JCLC* 推薦優秀中文論文，翻譯或改寫後用英文出版。兩個姊妹雜誌將嚴格遵循匿名審稿的原則，以確保論文的質量，並爭取做到基本同步刊登論文中英文版本。

《嶺南學報》自最初創刊至今已近一個世紀，相信結合嶺大同仁之戮力同心，爭取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必能無愧前賢，宏揚嶺大重文史研究之傳統，彰顯嶺大百年學術精神，使《學報》成為中外學者交流切磋的學術平臺，躋身學界一流學術刊物之列。

(作者單位：嶺南大學)

^① 馬幼垣《編者言》，載《嶺南學報》新第3期(2006年)。